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别了， 莎菲

丁言昭 编选

在做人方面，她却不大像个女人，没有年青女人的做作，也缺少年青女人的风情。她同人熟时，常常会使那相熟的人忘了她是一个女子，她自己仿佛也就愿意这样。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个男子，她明白两个男子相处的种种方便处，故她希望在朋友方面，全把她自己女性气氛收拾起来。

MAN YI NU ZUO JIA CONG SHU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别了， 莎菲

丁言昭 编选

在做人方面，她却不大像个女人，没有年青女人的做作，也缺少年青女人的风情。她同人熟时，常常会使那相熟的人忘了她是一个女子，她自己仿佛也就愿意这样。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个男子，她明白两个男子相处的种种方便处，故她希望在朋友方面，全把她自己女性气氛收拢起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了,莎菲/丁言昭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

(漫忆女作家丛书)

ISBN 7-02-003367-9

I. 别… II. 丁… III. 丁玲-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6881 号

丛书策划:郭 娟
责任编辑:岳 洪 治
版式设计:刘 小 沁
责任校对:刘 光 然
责任印制:周 小 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5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8.00 元



云霞出海曙， 辉映半边天

——“漫忆女作家丛书”序

陈漱渝

在中国，女性自觉投身文学创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一部分的历史是短暂的。虽然历史上曾陆续出现过卓文君、班婕妤、蔡文姬、李清照一类才女写作，虽然晚清革命家秋瑾已经在她的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由古代女性写作向现代女性写作过渡的先驱，但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出现还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她们是——“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冰心语)、其后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从“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茅盾语)的庐隐，擅以闺秀笔致写“旧家

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她们的作品表现出对妇女人权,特别是婚姻自由权、教育权、职业权的密切关注,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勇敢挑战。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页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第二代女作家群体涌现于三、四十年代。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她不拘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能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而使其作品最具有近、现代女性的“强己”意识,也最具有面向整个社会和面对全部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是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她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语)以及更广阔的事世人心。四十年代沦陷区上海“不合时宜”地出了一位张爱玲,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隔着时代一惊再惊。此外,在第二代女作家中,至今还留在读者记忆中的还有“文儒女侠一身当”(柳亚子语)的谢冰莹,有与凌叔华并称“珞珈山三女杰”的苏雪林、袁昌英——她们集作家、学者、教授于一身,有因肩负特殊使命而蒙冤廿七载的左联女诗人关露——她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作者,有“喝过鲁迅奶汁”的草明、陈学昭,有巴金关怀、培养过的罗淑、罗洪,有跟老舍共同创作过话剧《桃李春风》的赵清阁,有创作、翻译均结硕果并成功自办了出版社的沉樱,有以创作历史小说崭露头角而后来以填写古典诗词赢得盛誉的沈祖棻,有怀着“焦灼的渴意”进行创作的九叶



派诗人陈敬容,有因短篇小说《贵宾》含沙射影“攻击江青”而在文革时期遭到批判的葛琴……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中国女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取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表现出女性审美体验的失落。但即使如此,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她们的作品仍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考,渗透出女性情感、心态、价值观念的特殊色彩。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基本上都被革除,中国年轻的女性创作当然更没有立锥之地。直到百废俱兴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改变了“男女都一样”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女性创作才重新复苏,并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诸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不过,也有些女作家在都市文化意识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价值,步入了创作误区。有人热衷以“小女人”心态咀嚼身边的小小悲欢,有人过分热衷于与性相关联的“身体书写”,这些倾向显然背离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女性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实,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都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文中出现的Feminism一词。这是一种谋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旨在消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由于女权主义的译法容易使人产生女性张扬自身霸权的误读和偏见,目前在港台及其它华人地区比较约定俗成的译法是女性主义或女性性别主义。从强调角度而言,女性主义更为关注性别差异,强调性压迫、性歧视、性的不平等给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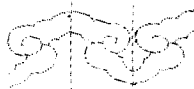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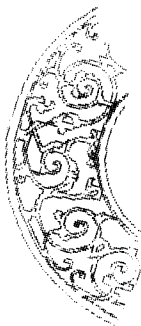
带来的种种压抑。显然,中国现代出现的女作家并不都是女性主义者,她们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一律划归于女性主义文学范畴。根据我的理解,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必须以女性为创作主体,不是男性作者以女性题材写出的作品;而且女性作家必须自觉以女性意识进行创作,并在作品中鲜明体现出性别立场和女性的美学情愫。“女人写”或“写女人”的文学作品并不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只有女作家以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描绘,并且在艺术方法上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建构进行颠覆和反叛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作品,大多只能称之为女性书写或女性创作,而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统统塞进女性主义文学的靴子。

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跟西方女权运动的区别,因为这个问题跟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创作(或曰女性书写)有着密切关联。自1902年同盟会成员,近代文学家马君武译介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开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跟男性革命家和男性进步学者的倡导密不可分,取一种“常青指路”模式,而没有出现西方文化中那种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更由于面临着“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远远超过了男女性别间的对立。如果中国的妇女运动不汇入挽救国家危亡、推进民主政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如果妇女不首先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就根本谈不上其它人权和女权。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运动。在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创作不但无法跟反映并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主流文学脱节,不但无法跟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脱节,而且



不少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还自觉淡化性别意识，将自己独特的性别遭遇转换为对民族命运种族生存的关注，以一种“大女性精神”进行创作。丁玲拒绝为《真善美》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稿，宣布只卖稿子不卖“女”字。谢冰莹要做“女丘八”。冯铿“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妇女运动概论》）。白薇要做“女子汉”，用文学的武器表现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杨刚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处于“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的境地，决心跟蹂躏“中国皇后”的强盗拼死斗争，随时准备牺牲。曾克卸下红妆，以随军记者身份挺进大别山，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创作了大量史诗般的战地通讯。菡子更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战士生活和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艺术生命。”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作品跟优秀文艺作品划上等号，只要我们不把女性经历局限于女性隐私、性心理、性经历，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视为唯一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就能对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估。

正因为中国现代女性创作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好比“云霞出海曙”（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映红了现代文学的半边天，深入研究这些女作家的生平史实和心路历程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漫忆女作家丛书”既是研究中国女性创作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基本建设。丛书所收诸篇提供的都是作者亲历、亲闻、亲见，更增添了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多年来，我阅读并研究了不少回忆录作品，也曾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对回忆录写作的意见。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对待回忆录应取的态度是八个字：不可不看，不可尽信。“不可不看”，是因



为作为史传文学的回忆录能弥补媒体信息储存和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文学史料的仓储。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学科,像苏雪林、谢冰莹、凌叔华这样撰写过自传或像庐隐、萧红、王莹这样撰写过自叙性作品的作家并不多,所以作家同时代人提供的回忆和评价就显得更为珍贵。“不可尽信”,是因为任何回忆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回忆者个人立场、观点、情感和接触范围的局限,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而且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要求记忆跟事物的本来面貌完全吻合,也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阅读回忆录的同时必须对所提供的史料进行核实和鉴别。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他人的回忆如果跟作者本人的自述不符,一般应以自述为准。不同回忆者对同一件事说法不一,一般应尊重多数人的说法,但也应该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一回忆者不同时期的说法如果互相抵触,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说来较早的回忆往往比较迟的回忆更为可靠。回忆如果跟事实不符,则应该无条件面对事实,承认事实。严格的真实性是回忆录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夸张或掩饰的回忆录只会惑乱视听,给读者以误导。在回忆录中,存心作伪的情况也间或出现,这种赝品更值得我们警惕。

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丛书策划人和有些编者希望我写几句话充作序言。时值苦夏,酷热难熬,我勉力写了以上文字,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历史地位和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我只了解这套丛书的选目,并没有审读所收的全部回忆文字,因而不可能对这些回忆录的史料性和文学性一一作出具体评价,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参照作家作品及其它相关资料,自行作出科学的判断。

2000年7月25日





目

录

- 1 女作家丁玲 茅盾
- 6 记丁玲(节选) 沈从文
- 71 丁玲的“傲气” 施蛰存
- 75 丁玲胡也频在济南 峰毅
- 82 我们的朋友丁玲 蓬子
- 107 丁玲印象记 赵景深
- 109 忆三十年代丁玲同志的二三事 郑育之
- 117 毛泽东与丁玲——陈明访谈录 张素华 边彦军 吴晓梅
- 137 毛泽东和丁玲的二三事 甘露
- 145 丁玲同志 史轮





- 158 永不消逝的春天——悼丁玲 朱子奇
- 167 你没有走——悼念丁玲同志 袁静
- 170 历尽严冬梅更香——悼念丁玲同志 马烽
- 182 忆良师丁玲 西戎
- 190 真诚坦白的心灵 陈企霞
- 196 丁玲在抬头湾 康濯
- 201 回忆母亲丁玲——一九五七年前后 蒋祖林
- 267 三访汤原 陈明
- 287 记入狱 陈明
- 293 献给幸存者的花束 冯夏熊
- 300 又见塔影——访陕七日中的丁玲 萧云儒
- 315 “我丁玲就是丁玲” 杨桂欣
- 327 一位女僧给陈明的信 佚名
- 329 悼念丁玲同志 蹇先艾
- 334 悼丁玲 冰心
- 337 悼丁玲 叶圣陶

附 录

- 339 鲁迅与丁玲 陈漱渝
- 342 编后记 丁言昭



茅盾 女作家丁玲



大约是1921年罢，上海出现了一个平民女学，以半工半读号召。那时候，正当“五四”运动把青年们从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唤醒了来，“父与子”的斗争在全中国各处的古老家庭里爆发，一些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的大都市内找求她们理想的生活来了；上海平民女学的学生大部分就是这样叛逆的青年女性。

我们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

民女学的学生。那时候，她不叫做丁玲，叫做丁冰之。按照中国的习惯，她应该用她父亲的姓——蒋；但是她戴了她母亲的丁姓，因为她觉得男女既是平等的，那么子女们也可以用母族的姓氏。这也是那时候很普遍于青年男女间的一种思想。

在平民女学的丁玲女士是一个沉默的青年。她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王剑虹女士和王一知女士。前者是四川人，后者和丁玲同乡，也是湖南人。王一知不久就倾向了xx主义，而且加入了xx党，但当这三位青年女性做好朋友的时候，她们全有很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平民女学的创办者(陈独秀和他的朋友)因为种种困难，不能使这学校按照他们的理想；丁玲女士她们大概感到失望，所以不久就退学。以后一年中间，她大概没有正式进学校，她和她的朋友王剑虹女士曾在南京住过一些时，过“自修”的生活。1924年，她又正式进学校，仍旧和王剑虹在一处。这学校便是后来在“五卅”运动中很起了领导作用而且产生了不少革命人才的上海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她好像对于政治还不感多大兴趣，思想上她还是近于无政府主义。

在上海大学大约一年光景，丁玲到别处去了。那时，她的好朋友王剑虹女士也像先前的王一知女士那样倾向于xx主义了，而且不久就因为肺病死了；也许丁玲因此感到寂寞，因此要换环境了。

1927年，丁玲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那时她始用“丁玲”这笔名。这个名字，在文坛上是生疏的，可是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认识了。接着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人们于是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



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颂赞；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然而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她终于从腼腆拘束的心理摆脱，从被动的地位到主动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以后，她就一脚踢开了她的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但那时中国文坛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中国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正在勃发。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长久站在这空气之外。于是在继续写了几篇以女性的精神苦闷(大部分是性爱的)作为中心题材的短篇而后，丁玲女士开始以流行的“革命与恋爱”的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了。这就是那《韦护》。这是一部八九万字的长篇小说。在这里，丁玲企图描写她那已故的好朋友王剑虹女士的思想转变。书中的主角丽嘉就是王女士的影子，而男主角韦护是一个老牌的xx党员。这两个人的恋爱结合很有几分Romantic味，特别是在女主角那方面。丽嘉的思想性格，多少有些和莎菲女士相像，她的恋爱的发生与其说是由于男主角那方面来的思想的感应，还不如说由她那少女的好奇心和浪漫的情热。所以在结合后，丽嘉虽然接受了xx主义，却终不免因为恋人的忙于工作而夺去了他俩的温柔蜜爱的时间而感到戚戚。直到那男主角觉得“恋爱”已经无形的妨害了工作精神而决然舍去的时候，丽嘉方始觉悟，也说要决心投身于实际的革命工作了。而这小说也就在此完结。在这结尾，





丁玲特地改变了她的故友的事实，表示了革命战胜了恋爱，但是在全体上，除写了丽嘉那种热情的狷傲的个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认识而外，那位男主角韦护是表现得并不好的。那时候（大约是1923年——24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的描写也是一个缺点。

如果《韦护》这小说是丁玲思想前进的第一步，那么，继续着发表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就是她更意识地想把握着时代。这也是将近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1930这年上海的群众运动为题材。知识分子的主角是懒惰的不革命者，闹哄哄的左翼。学生运动对于他并没有多大影响；但是他的妻——书中的女主角，却积极的参加了工人运动。于是在动摇矛盾的丈夫和极革命的妻中间，发生了“革命与恋爱”的冲突。结果那个妻为了革命而舍去了恋爱。所以在题材上，这《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大约和《韦护》相仿佛；不过作者努力想表现这时代以及前进的斗争者——这种企图，却更明显而且意识的。

一直到这时候丁玲好像尚未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虽然她爱人胡也频已经是那联盟中的积极分子了。接着就是胡也频与其他四位作家的被捕被杀。丁玲女士个人对这xx恐怖的回答就是积极左倾，踏上了那五个作家的血路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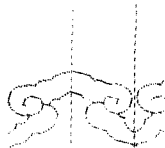
从1931年夏起，丁玲再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阵外的“同路人”，而是阵营内战斗的一员。那对中国的左翼刊物悉遭封闭，出版左倾书报的书店都受严重的压迫，左翼作家联盟在整顿阵容，改变了战略以后，乃有《北斗》杂志出版。这是当时全中国在左联领导下的惟一的文艺刊物。丁玲女士当了编辑。她的短篇小说《水》就在这刊物上发表。《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这是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的水灾作为背景的。遭了水灾的农民群众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们和洪水奋斗，和饥寒奋斗，最后，逃到城市的时候，又和欺骗他们的官吏绅

士放赈员奋斗,终于和自己队伍中的动摇思想奋斗。全体的农民就革命化起来,这是1931年大水灾后农村加速度革命化的文艺上的表现。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而且在事后又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可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

沿着这路线,丁玲又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上海的革命斗争是那些小说的题材。为要充实她的生活经验,她在“九一八”以后参加了许多实际斗争。左翼作家联盟所积极进行的工农通讯员运动,丁玲也是实际工作者和指导者之一。在左联的干部中,她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她的xx,不用说是中国左翼文坛一个严重的损失。

她的最近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奔》,发表在五月号的《现代》。这是描写了农村经济破产下的农民到大都市里来找工作,可是大都市也挤满了失业者,于是他们不得不再回老家去,可是他们坚决的说:不能再忍受地主的剥削了!此外,丁玲又写了长篇小说《母亲》,据说尚差万把字没有完篇可是她就xx了!

(原载《文艺月报》第2号,1933年7月15日)





沈从文

记丁玲

(节选)

—

1923的春天,北京的春雪还不消融,大街小巷各处皆黑泥白雪相对照,



天空中有“一块瓦”风筝飘扬,我在北京西城所住的一个公寓里,认识了一个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当我们把话谈到各人所生长的地方时,我告诉她我的家乡在凤凰县,

丁玲在环龙路,同坐者是作者之妹沈女士